

廣州歷史 探真

從任囂城到十三行

陳澤泓

著

中華書局



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

陳澤泓 著

責任編輯 盧爭豔 黃嗣朝
裝幀設計 姚雙林
排版 賴豔萍
印務 劉漢舉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2137 2338 傳真：（852）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電話：（852）2150 2100 傳真：（852）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版次 2026 年 7 月初版
© 202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格 16 開（240mm×160mm）

ISBN 978-988-8959-05-1

文化傳承與地方歷史的建構

——《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序

陳春聲

與日常生活中依靠家庭內部和周遭環境的「耳聞目染」或「身體力行」，就可以一直沿習下來的風俗習慣不同，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是需要許多有心人的悉心守護，需要專業化和制度化的學術研究、寫作出版和教育宣傳等，才能夠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文化傳承的責任，更多的是通過人文學者的專業研究和社會活動來達成的。置身於全球化、數字化的話語環境之中，面對着日益受到 AI 影響的相互化用、欠缺新見的文史敘述風格，像澤泓先生這樣，對地方歷史文化存着一份敬重和珍惜之心，幾十年如一日植根本土，孜孜不倦地進行實地調查、口述記錄、資料整理、文獻考訂和綜合研究等扎實工作，才是學有所本，樸實而能傳諸久遠的。如《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這樣，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地做好最基礎的學術積累工作，才是文化傳承的「正途」。

《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是一部功力深厚的考訂廣州兩千年發展史實的著作。廣州在中國的城市發展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和面相，建城兩千餘年來，其複雜辯證的發展邏輯中，既有長期尊崇王朝法度和儒家意識形態的核心脈絡，又一直存續着豐富且充滿矛盾的各種民間慣習和宗教信仰；既始終展現維護大一統的政治文化主流，又從未

間斷與外部世界的密切聯繫，且顯得大道自然、渾然天成；建城伊始即有城垣、宮殿、衙署和禮儀台壇等等合乎傳統中國城市「規制」的建築群體，而其不斷發展演變的城市格局又一直保持着非常明顯的「城鄉連續體」風貌。正如本書所呈現的，廣州城市建基於嶺南亞熱帶地區河海交匯、「三江匯合」而獨具特色的地理、氣候和生態環境之上，又因「南島語系」史前文化基因的氤氳浸潤，其市井形態、大眾生計生活方式、信仰行為和文化生態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千年延續，既厚重深沉又多姿多彩，堪稱中國城市史綜合研究的富礦。也正因為如此，關於廣州城市歷史的記載和研究，也就一直存在諸多缺失舛誤、見仁見智，甚至以訛傳訛之處。陳澤泓先生數十年深耕嶺南歷史、嶺南文獻、嶺南宗教文化和嶺南建築等學術領域，成就斐然。尤其是長期主持廣州地方志編修工作，對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滄桑沉浮，用心良多，積累深厚，更有諸多人所不及的學術感悟和體驗。《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以嚴謹平實的學術態度，對廣州兩千多年城市發展史的 40 餘個重要問題作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認真考辨。這些問題或文獻記載不詳，或前後說法不一，或當代學者觀點不同，長期困擾嶺南學界，澤泓先生探賸發覆，厚積薄發，得出許多證據可信且入情入理的結論，真的令人不由得掩卷歎服。

這部著作既重視歷史文獻的研讀考證，又大量地汲取了考古發掘、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的成果，既關注學術史和當代研究成果，又儘量理解歷史上當事人和普通民眾的情感與立場，努力引導讀者回到歷史現場，所思所言，富於啟發意義和文化傳承價值。例如，關於任囂城址和廣州城選址問題的考辨，細讀之下，眼前自然而然地就能浮現出秦漢至明清兩千年間，從越秀山麓到珠江之濱，地貌、水道、岸線、田園、市井、建築乃至生態環境等城市變遷的風貌。結合書中一再提到的近百年考古發現的諸多遺址、墓葬、器物 and 圖像，具體到歷朝歷代城市給排水

系統的佈局和設施，不同時代廣州人日常生活及其與外部世界密切交往的場景，也就如在眼前了。

《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對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關注，還表現在關於城市宗教信仰形態存續變遷的詳細考證和描述上。全書 40 餘個條目中，超過四分之一是關於宗教史事和信仰習俗的，既包括制止寺（法性寺、光孝寺）、西來寺、大佛寺、寶莊嚴寺（六榕寺）、光塔寺、三元宮、南海神廟、城隍廟等等廟宇的歷史變遷及其與城市發展的關係，還有葛洪、何仙姑、達摩、惠能等等著名宗教人物在廣州的活動或者傳說，內容涵蓋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及其不同教派，還有官方祀典禮儀和民間祭祀習俗等多種信仰形式。宗教信仰內容在書中佔有這麼大的篇幅，應該不是作者格外關注或刻意安排的結果，而更可能這正好就是城市發展歷程中，複雜多元文化形態的客觀寫照。多種本土和外來宗教形式長期繁複存續的史實，從一個生動的側面，自然而然呈現了自古以來這所嶺南名城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實圖像。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指出，鄉土社會是「面對面的社群」，其知識與社會性規範的傳承主要依賴口傳、禮儀與日常生活實踐，而未必非文字不可。我們知道，宗教信仰作為民間文化的一部分，也會自然地以非文字形式滲透在節慶、祭祀、習俗等集體活動中（如祭祖、廟會、風水實踐），成為維繫人群認同的日常紐帶，所以，宗教信仰和儀式行為對於「目不識丁」的普通百姓來說，或許有着更明顯的「教化」作用。而且，就嶺南地方而言，普通民眾即使有機會接觸和接受文字，其最初的途徑往往也不一定是私塾、書院、官學等講習儒家義理的機構，更可能的是來自和尚、道士（喃嘸先生）等宗教職業者在婚喪節慶等日常儀式活動中講經說法的內容。也就是說，宗教信仰同樣是傳統時期文化傳承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信仰和儀式活動一代一代、自然而然地參與形塑民間社會許多不言而喻的行為法則，而廣大民眾的虔誠與熱心，又構成這座城市多種宗教

和信仰形式長期並存，交相發展的社會基礎。這樣的情形，在《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中直接間接地也有較多展現。例如，南北朝時「達摩自西域入中國，而人信者眾矣」；唐上元年間寶莊嚴寺（六榕寺）舍利塔放光，「頃都共仰，溢郭周寬，士女幾乎數里」；唐開元年間佛教密宗高僧不空在法性寺為信眾灌頂，「相次度人百千萬眾」；時至今日，南海神廟的「波羅誕」依然人山人海；等等。類似的描述還有很多。

當然，正如我們反覆強調的，在傳統中國的地方歷史文化研究中，「國家」的存在仍是所有研究者必定要高度重視的核心問題。對於我們這樣一個保存有數千年歷史文獻，關於歷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記載相當完備，國家的權力和使用文字的傳統深入民間社會，具有極大差異的「地方社會」長期擁有共同的「文化」的國度來說，地方社會的各種活動和組織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學的文獻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發現其「合理性」的解釋。區域社會的歷史脈絡，蘊涵於對國家制度和國家「話語」的深刻理解之中。從秦平嶺南的歷史進程開始，直至關於學海堂在整個國家學術文化發展重要地位論述，貫穿《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全書的主線，反映的正是大一統國家的典章制度、法度禮制和意識形態在本地被接受、尊崇和弘揚的過程。

多年的研究實踐，也讓我們越來越明晰地認識到，大一統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一致性，又是以其相互密切聯繫的區域間發展巨大的時空差異為前提的。也可以說，地方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不平衡性和各地域間永無休止的矛盾及其調適，正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統一國家且長期存在的邏輯起點。細讀《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自然能夠感悟到，廣州城市的歷史發展，也為以上這個帶有某種歷史辯證法的學術判斷，提供了富於啟發性的生動例證。例如，儘管趙佗一度在此立國，自稱「蠻夷大長老」，但南越國的政治制度、禮儀規範、宮苑建築

形制和日常器物所體現的物質生活的許多內容，依然尊崇中原王朝的規矩，且一有機會，南越國就馬上恢復對漢朝的臣屬關係；又如，明清易代之際，包括屈大均、金堡（澹歸和尚）等在內，有許多前朝遺民長期在這個城市生活，其行為和文章對後起的嶺南士子影響深刻，而他們的引人共鳴之處，不僅僅是其學問和思想，也包含了如何堅持「忠孝節義」等儒家倫理的精神世界，其中當然也有掙扎與焦慮；再如，在本地有着廣泛民眾信仰基礎的城隍廟，傳說中擔任都城隍的楊繼盛、海瑞、倪岳和李湖，都是明清兩代的名臣和清官，儘管他們在生之時也曾有不得意甚至蒙冤的經歷。可以說，要理解歷史時期廣州百姓的物質生活與精神世界，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像陳澤泓先生這樣，對朝廷典章制度和地域社會變遷的整體面貌有深刻的理解，富於同情心地解讀歷史資料和地方文獻，理解當時人的生活與情感。

我們還有一個經驗，即判斷一個地方是否理解和接受王朝的意識形態，不在於這個地方根據朝廷的法度對本地的風俗習慣做了多少實質性改變，而在於當地的讀書人和士紳階層，在多大的程度能夠自覺地、自圓其說地將本地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解釋得符合朝廷的「禮法」。只有培育出這樣的思維辯證，才算是對地方文化研究的要旨有比較透徹的感悟。正如本書所揭示的，明代中葉開始，嶺南的士大夫階層在重新解釋和建構地方文化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而清代後期阮元在廣州創辦學海堂，其教學規制、文獻出版和人才培養，更是為地方文化建設成就了足以傳世的事功。

多年參與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經歷，使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自己所從事的是一項與個人的情感可以交融在一起的工作。只有親身參加過文獻研討和田野調查的同行才能真正理解，在認真研讀歷史文獻且富於同情心地了解學術史的前提下，走向歷史現場，踏勘史跡，採訪耆老，蒐集文獻與傳說，記錄圖像和聲音，聯接過去與現在，引發兼具歷史感

與「現場感」的專業思考，其中所蘊含那種令人神往的境界。我們都熱愛自己的工作，熱愛自己所記錄和研究的人們，熱愛這些人們祖祖輩輩生息的山河和土地。在大多數情況下，學術傳統與個人情感的交融，賦予這樣的工作以獨特的魅力。作為在羊城學習、工作了近半個世紀的史學研究者，有機會提前拜讀澤泓先生這部關於廣州歷史文化問題的平實謹嚴又富有新意的著作，心中湧出的，仍是這樣溫暖的感覺。

是為序。

2025 年國慶假期
於廣州康樂園永芳堂

前 言

治史者，以存真求實為境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即文獻資料證以考古實物之法以還原歷史真實，從理論上說固然理想，操作起來並不容易。文獻資料是人寫的，字裏行間免不了執筆者的主觀意識，且不說粗疏訛詐，勝王敗寇，更不要說遊文戲說，兩千多年的尊卑美醜善惡觀，不同程度的抑揚隱顯、忌諱諛飾，也籠罩着幾乎所有的歷史文獻。考古實物中「考」的過程也有主觀意識，考古者先入為主、以偏概全乃至以假為真錯判文物的事例屢見不鮮，甚有因出自各種動機而指鹿為馬、移花接木、異想聯翩的，何況一地一物只是能是整體的截面，難避瞎子摸象、一葉障目之論。所謂真、實，當是符合客觀的結論。存真求實，就是縮小或消除兩者之間的距離，這只是一種願景，談何容易。先叫一番苦，不是為了標榜本書就能夠做到存真求實，而是說明存真求實之不易，一要追求接近史實，二不要輕信終極之說，無非是一種努力，志在發聲，捫心無過則可。

廣州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也是嶺南中心地，有關廣州歷史文化的出版物不可勝數。因修志、寫書關係，觸目所見，發現關於廣州城歷史的一些說法值得推敲，甚至漏洞百出，卻因口口相傳而三人成虎，屢見不鮮，習以為真。這些說法關係到廣州人文、歷史、城建、宗教等領域歷史圖景的展示，有的直接影響到史事陳述、社會行為及學術研究。從事地方志工作以來，出於好奇，查閱資料，粗率思考，撰文為關注廣州歷史的一些聚焦碎片，參與學術研討的一得之見，多已發表在《學術研

究》《廣東史志》《羊城今古》《文史縱橫》等刊物上。積累下來，有數十個題目。至此，集成一書，既供有興趣了解廣州城的史事或者從事相關課題研究者參考，更望拋磚引玉，就正方家。

我於史學，無由入名師之門，純屬在史門之外探頭探腦者，好在得從事修志工作之利得以研讀舊志，略有所知所得，更有幸近窺一些治學謹嚴成就卓著的老師之學問人品，深受教益，但先天不足，年事已高，至此只能望洋興歎。文中不少觀點採自歷史界、文博界學者的研究及考古成果，這些真知灼見給了我甚多教引，惜其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沒有充分發揮其振聾發聵的作用，因恭引彰示。在此，對秉持高見的前輩及同道者表示衷心的謝意！也希望能以此引起對廣州歷史文化正本清源的更多關注討論。

本書部分圖片由許博涵拍攝提供，在此致以感謝。

目錄

文化傳承與地方歷史的建構	
——《廣州歷史探真：從任囂城到十三行》序	陳春聲 / i
前 言	vii
廣州別稱何解	001
番禺之稱釋源	008
秦平嶺南軍事之謎	016
任囂身世之謎	024
何處任囂城址	032
廣州城選址探析	040
趙佗城及朝漢台考說	050
船台殿基定性之爭	058
素馨花是陸賈傳入嶺南的嗎	066

廣州一直是嶺南政治中心嗎	073	張鎮孫以廣州城降元辨	226
楊孚《南裔異物志》是物產志嗎	082	大德《南海志》中的元廣州城	234
光孝寺始稱制止寺釋名	090	鎮海樓為何始稱望海樓	243
康泰、朱應何處揚帆出使	097	尚可喜是什麼樣的人	252
葛洪岳父是鮑玄還是鮑靚	104	如何看待屈大均與清官員的交往	260
達摩是否創建了西來庵	113	最值得稱道的廣東狀元是誰	268
南海建縣時間考	122	盤點廣東都城隍爺	275
隋南海縣治考	130	清代廣州是一口通商口岸嗎	284
光塔創建何時	141	大小馬站是條書院街嗎	291
王勃碑記與六榕塔之謎	150	學海堂創辦於越秀山嗎	300
密宗入粵在廣州留下什麼文物	158	鄒伯奇是否造了中國第一部攝影機	311
海陽館與市舶亭考	164	林則徐廣州何處留足跡	319
何仙姑是怎樣修成仙的	174	潘仕成身世考	329
惠能為何選擇廣州開東山法門	182	海山仙館尋蹤	337
南漢藥洲稱名考辨	193		
大佛寺南漢前身考	197		
為何等到程師孟才建西城	202		
楊萬里謁西廟還是謁兩廟	210		
六榕寺名何時成正稱	218		

廣州別稱何解

廣州別稱，有五羊城（穗城）、楚庭、南武城。對這些別稱如何理解，從中折射出什麼歷史的信息，是本節要說的話。

先釐清附着這些別稱的正稱「廣州」的概念範疇。作為地名的「廣州」一詞，有三種意思：

一是作為行政區劃之稱，廣州是三國東吳於黃安五年（226）從交州分出創置，「廣州」一詞面世至今正好 1800 年。今時常見的所謂「廣州二千年」，是從廣州建城說起，只是一種籠統之說。明清時期設廣州府，民國以後設廣州市，二者也常簡稱為廣州。歷史上，還有南北朝時期的廣州都督府、隋唐的廣州總管府、唐代廣州大都督府之稱，是主管軍事的行政區劃，其管轄包括數州，不會被簡稱為廣州。

二是指歷史地域，如作為廣州話、廣州菜、廣州人的冠稱，其地域範圍未必能說得很具體，因為歷史上的廣州、廣州府、廣州市轄境及轄屬變化頻繁，說者也不求甚解。

三是指廣州城，其範圍或涵蓋廣州城郊（諸如白雲山、海珠島、西關、東山就在城外）。廣東人民出版社近日再版曾昭璇先生著作《廣州歷史地理》，書名的「廣州」所指即此範圍。老一輩的廣州人在日常生活中，習慣將舊時廣州城內稱「廣州」，如五山居民入城，會說「去廣州」。

本節說廣州史事，使用的「廣州」概念，是第三種意思。為什麼這麼講究？因為地名概念搞混了，有時會遇上尷尬。《廣州日報》近年設有個欄目「讀懂廣州二千年」，專講廣州掌故，很愛讀者歡迎，2023 年

策劃將該欄目已發表的文章結集出版，以欄目名為書名。我在評審書稿時，猜測書名之「廣州二千年」的說法，應是源於廣州建城二千多年的約稱，但所載文章是今廣州市七千多平方公里轄境內的史事，述及考古發現就有距今六七千年的事，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書名「廣州二千年」都不相符。該書書名因出版程序來不及修訂，此後見《廣州日報》欄目改為「讀懂廣州」，也算是修正。

廣州別稱羊城，人盡皆知。羊城為城的名稱，稱羊城的「廣州」，原指廣州城，當代被擴用於廣州市，如「羊城國際粵劇節」，即為廣州市粵劇節。羊城別稱源自家喻戶曉的五羊神話，這是一個寄託着對美好生活嚮往的美麗的城市神話。「穗城」之稱則來自五羊傳說中的五羊口嚼五穀穗而來。長期以來，論者都說記載五羊傳說最早的文獻，出自晉人顧微、裴淵分別所著的同名志書《廣州記》。兩處文字大同小異，這裏引裴記所說：

廣州廳事樑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嚼穀莖於楚庭，於是圖其像。廣州則楚分野，故固圖像其瑞焉。

說的是廣州官廳上的一幅畫，因為廣州一名始於三國吳，這裏說的也是三國時吳國的事了。畫裏的五羊故事，則是傳說中高固為楚威王時為相的故事。史上實有其人的高固是春秋齊國大夫，阮元主修的道光《廣東通志》為「南海人」高固列傳，並在傳後加按語稱「未知何時由齊遷越，臣服於楚」，進而斷定將此事安到高固頭上「實無確據也」。可見這是一筆前人都說不清的糊塗賬。

其實，記載五羊傳說的文獻還有更早的。《太平御覽》「廳事」類目載引裴淵記載五羊傳說的事條之前，輯載有鮮為人所留意和引用的另一

事條：

《郡國志》曰：「廣州吳孫皓時以滕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樑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

此條目將五羊傳說發生時間置於三國吳時而不是「楚庭」之時，相關人物不是「南海人高固」，而是吳時廣州刺史滕修。楚威王在位至公元前 329 年，吳末帝孫皓在位至公元 280 年，相差六百年。自來文人崇古，因而對此相鄰的兩個條目，後人多不採用《郡國志》條目之說，罔顧其經不起推敲而寧願取《廣州記》條目之說。

到了清代，在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中，對此傳說的發生時間，甚至語有牴牾。是書「五穀神」條目說是：

晉吳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止州廳上，其後州廳樑上圖畫以為瑞，號廣州曰五羊城。

同書「五羊石」條目竟把五仙騎五羊「來集楚庭」的故事，前推到距今約三千年前，約在公元前八百多年



古之楚庭坊

的西周「周夷王時」。這反映了五羊傳說傳至明末清初時已有各種說法，屈大均將兩說收入同一書中，甚至將曾任職吳晉兩朝的廣州刺史滕修的名字訛稱為「晉吳修」。

《郡國志》是《三吳郡國志》的簡稱，作者是三國吳人韋昭，撰修時間早於晉人《廣州記》。韋昭曾任吳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參與撰《吳書》，奉命校定群書，官職累遷侍中，領左國史。韋昭因屢忤吳末帝孫皓意，被下獄整死，未能活到晉代。《郡國志》當撰於三國期間。此書將五羊故事產生的背景放在滕修任廣州刺史之時，並非偶然。滕修奉孫皓旨意，征討在廣州發動兵變的郭馬，得封安南將軍、廣州牧，成為鎮守廣州的封疆大吏，是在廣州很有威信的行政長官和名將。晉武帝伐吳，才三四個月，孫皓投降，吳亡。晉武帝頗有治國之才，大膽留任前吳官員，「牧守以下，皆因吳所置」。因而滕修仍繼續主政廣州，認真執行晉武帝制定的「除其苛政，示之簡易」的政策。在他任內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廣州政局比較穩定。這從後來出土於廣州的晉磚所刻銘文「永嘉世，九州荒，如廣州，平且康」「永嘉世，九州凶，如廣州，平且豐」，也得到印證。五羊故事發生在滕修主政廣州期間，既反映了當時廣州人民對安居富裕生活的嚮往，也反映了吳末晉初廣州地區相對平穩小康。吳、晉代志書均記載了五羊故事，離傳說誕生時間不遠，反映了顧微、裴淵，特別是韋昭等修志者捕捉題材的敏感性。

從《郡國志》《廣州記》至《廣東新語》，可見五羊傳說演變過程中，存在將這一神話故事的發生時間不斷上移的趨勢。其中還引出了「楚相高固」「楚庭」等人物、地稱概念。明人黃佐的《廣州先賢傳》，首列高固傳。阮通志既轉載了高固傳，卻又在傳後「謹按」，作否定之分析：

固為楚相，豈有去郢適粵之事耶？後人因此附會固為南海人，實無確據也。

是說高固任楚相時，楚都在郢（一說春秋時楚文王定都於郢，即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紀南城；一說凡為楚都皆稱「郢」），豈有他離開楚都跑到粵地的事。後人附會說高固是南海人，並沒有確鑿根據。這也反映了晉人記載的五羊傳說，已被加工到不能自圓其說。正本清源，應當說吳韋昭的《郡國志》是已知最早記載五羊傳說的古籍。

楚庭，也有稱楚亭。先秦，楚國在嶺南建立管治機構的事，歷史文獻沒有確鑿記述。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載唐《通曆》：

周夷王八年，楚子伐揚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

楚庭（楚亭）作何解釋，考者說法不一。大體是說先秦時期，楚國入治嶺南，在今廣州地建立的機構或象徵性建築。考古未發現有足以說明戰國時在嶺南存在「楚庭」的證據。今越秀山孫中山紀念碑下東南方「百步梯」東側，立有題額「古之楚庭」的石牌坊。此坊始建於清初順治元年（1644），重建於同治六年（1867），題額落款「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孟春吉旦眾善信捐資重建」。可見其只是採用了楚庭傳說的民間行為，不足為證。

南武城一說出得遲，黃佐纂明嘉靖《廣東通志》載：

廣州城，始築自越人公師隅，號曰「南武」。後任囂、趙佗增築之，在郡東，周十里。

明志記述遠古的事，也有糊塗籠統的，即如嘉靖《南海縣志·官師志》記載「秦南海尉為屠睢、任囂、趙佗」，秦尉屠睢死於粵西疆場時，尚未平越，粵地尚未建郡縣，何來「南海尉」？

麥英豪依據廣州古城區迄今考古發現，認為秦之前各說均無考古依